

中国传统文化 及其现代价值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JIQI XIANDAI JIAZHI

张小荣 雷根虎 易宏军 / 编著



中国传统文化 及其现代价值

张小荣 雷根虎 易宏军 编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 张小荣、雷根虎、易宏军编.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5. 4 (2010. 8 重印)

ISBN 978-7-80712-111-4

I. 中… II ①张…②雷…③易…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645 号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编 者: 张小荣 雷根虎 易宏军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 编: 710061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4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2-111-4
定 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前 言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是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人文素质教育在我们过去的高校教育中却常常被忽视。令人欣喜的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中华民族的教育本是极富人文精神的，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清朝末年，人文教育一直是全部教育的轴心。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坚船利炮”和“全盘西化”的双重冲击。有人甚至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腐朽的文化，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这种偏颇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出现了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大潮中，教育又受到了功利主义的严重冲击，一些人对“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作过于功利的理解，以是否“实用”、对择业是否有直接效用为尺度，对专业和课程做了目光短浅的取舍。这无疑使高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

人文教育被忽视，会带来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价值体系的混乱。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个人至上，行为失范，缺乏批判性思考，整体观与想象力、知识面狭窄，整体素质不高。因此，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培养 21 世纪需要的合格人才就是一句空话。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只有具备良好人文素质的人，才会思考人类社会、自然、他人、自身的问题，才能真正懂得做人

的真谛。而人文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学科的教育。正是人文教育使人们了解世界，了解祖国，了解人类，了解自己，了解对社会的责任，从而才可能更关心世界、人类和社会。

当然，我们强调，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并不是否定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教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课。但历史表明，大凡贡献卓著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人文修养，都是“人文科学”型的学者。近百年来，中国老一辈科学大师在专修科学之前，其人文修养都很高。有了人文修养，才有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铸造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在科学研究的大道上百折不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科学大师，他们的成就是科学成就，但这种成就是在人文精神主导下才获得的。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精神一致的。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人会有健全的科学精神。

人文素质是多方面的，其中，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伦理学等等，是形成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文科学知识不等于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是人文科学知识的内化和升华。没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就难以实现这种内化和升华。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要奠定这个基础，固然需要学习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人文科学成果，但首先需要的是学习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不乏教人修身、立志、治国、安邦的大智大睿，也不乏同现代化并列不

悖甚至是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真知灼见。因此，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积淀着精华和糟粕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精华和糟粕，也有不少有碍现代化发展的、消极的、保守的、陈腐的因素。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克服传统文化的缺陷，剔除其中的糟粕，才能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在现代社会中大放光彩。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基本特征	(11)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23)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哲学	(3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33)
第二节 中国古代哲学影响下的传统文化	(64)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	(77)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77)
第二节 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开掘	(94)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宗教	(105)
第一节 儒、道、佛三教的基本精神特质	(105)
第二节 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	(116)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教育	(127)
第一节 中国古代教育的成就	(127)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教学思想的原则及其现代启迪	(146)

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文学	(159)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性格与基本特色	(159)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172)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史学	(18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成就	(181)
第二节 古代史学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	(192)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	(205)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和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205)
第二节 中西科学传统的比较与互补	(224)
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33)
参考文献	(247)

导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我们伟大的祖国雄踞在亚洲大陆的东部，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她不仅有着 96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13 亿勤劳善良的人民，而且有着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传统文化。从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有文字可考的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祖先以非凡的创造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了解、学习和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有助于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我们提高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应具备的基本人文素质。我们将以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内容分别作专题式的梳理与介绍。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

关于“文化”的概念，宽泛地理解，可以说成是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存在。我们在本书中把文化理解成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总和。因而文化应包含思想、典章、器物等内容，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大致相同，只不过我们所谓的文化概念更侧重于思想观念方面。从整个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发展来看，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主要在今伊拉克境内）、古印度（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作为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最古老的发源地，中国古代文明虽

然在时间上稍晚于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文明，但与它们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从她诞生直至今日，一直绵延不绝。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这一特性，使得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多彩，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一、远古时代多元多姿的文化源头

历史学家习惯地把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称为远古(或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化正是起源于这一现代人看来极为遥远的时期。人类学家发现，距今约 1500 万年到 1000 万年之前的拉玛古猿，是人类的先祖之一。在我国云南的开远县和禄丰县，都发现了这一古猿的化石，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1965 年在距开远、禄丰不过百里之遥的元谋县发现的元谋人化石，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了。这两则发现，使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源头得以科学的定位。

有了人，就有了历史，也就有了人在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远古源头正是因此而被逻辑地确定的。从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北京人(北京周口店)到马坝人(广东曲江)、长阳人(河北长阳)、丁村人(山西汾县)再到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河套人(内蒙古河套)、北京山顶洞人，在这样一个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文化逐渐萌生并发展起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发生，一开始即呈多元状态。不但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东北等北方地区以及青藏高原，都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

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因此也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地证明了，距今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取来的火种。关于火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他还肯定地指出：“甚

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

除了火的使用以外，在仰韶文化（河南）的典型遗址——半坡村遗址中，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原始先民已学会了农作、狩猎、制陶，发明了彩绘陶画和简单的音乐舞蹈；在大汶口（山东）文化遗址中除了有更加精美的陶器外，还出现了冶铜、酿酒、制玉、象牙雕刻等新的工艺。

与物质文化的发展相适应，远古时期的观念文化也呈繁花初绽的现象，而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常常发现太阳图形的纹饰。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繁衍的非常关注，又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和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先民们对生命祭祀的庄严情感。

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则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从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发现和保留了我国远古时代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就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另外，还有鱼、鸟、蛙、龟、蛇、猪、马，以及人们想像出来的动物，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二、百家争鸣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产生

中国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而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则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字的记载。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和认知水平的局限，这时期的文化是以神为本的，用《礼记·表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种以“天帝”、“上帝”为最高存在的神学观念广泛地见诸于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典籍以及青铜艺术品之中。

公元前 722 年，周平王被迫东迁。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

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的时代。然而就在这充满血火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百家争鸣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素材，而且也使他们“救世之弊”的社会责任感倍增。这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按照西汉学者刘歆的说法，气势恢宏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最重要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作为孔子之思想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提出了仁、义、礼、智的“四端说”，并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这一理论在先秦就有“显学”之称。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之学。



代表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是儒家学说广为流行的话，那末，到战国中期就是“孔墨显学”并行天下。墨子出身贫贱，史籍中称其为“贱人”、“鄙人”。从《墨子》一书中看出，他不仅是思想家，还是社会活动家。他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学术社团，加入的人大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纴”的人。可见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这些思想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文化性格。秦汉之后，曾作为显学的墨家学说逐渐衰落。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相传老子曾做过周王室史官，他还曾和孔子讨论过“周礼”。但面对着礼崩乐坏的争霸局面，他与孔子的积极有为精神相反，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自然是无为的。与孟子大约同时代的庄子

则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无为思想，并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史记》中就记载有庄子拒聘为相的故事。

除了儒、墨、道三家之外，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在当时也较有影响。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与公孙龙。名家好辩，当时被称为辩者。惠施与庄子不仅交往甚多，而且有过许多的辩论。《庄子》一书中保存了惠施“合同异”等一些著名的命题。公孙龙的著名命题则有“高坚白”、“白马非马”等。名家的好辩往往因为混淆名与实、一般与个别的区别而流于诡辩，但其思想对于启迪人的智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也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代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

以邹衍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点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家认为阴阳的矛盾双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界与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别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与孟子同时代的楚国人许行则是农家的代表，其学说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统治者应与民同耕、同食，这种平均主义的农民意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除了上述诸子学说之外，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由于其直接为君主权术作论证，故其思想影响不大。而“兼儒道，合名法”的杂家则主要是折衷糅合了诸家学说，故也无太大的影响力。小说家则被认为是记录“街谈巷语”的小道而不被看重。由此可见，真正构成百家争鸣核心的是儒、道、法、墨诸家，这些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尔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有容乃大”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昌盛

公元前 221 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统一帝国——秦王朝建立。但秦王朝统治不久，便因过于严酷的统治政策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

秦汉帝国的强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所以，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精神蕴含其中。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等等，无不是在秦汉时期产生出来的辉煌文化成果。

秦汉时期文化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是儒学因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而被定为一尊，因为强大的统一的帝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与之相适应。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独尊法家的强硬专制做法不同，董仲舒建议汉朝统治者独尊倡导仁义之说的儒学。从此之后，不仅有关儒学的经典之学——“经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而且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至清代，前后长达两千年之久。

汉末的董卓之乱，终于导致了汉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战乱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政权林立，大一统时代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有所放松，因此源于先秦的诸子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复兴了，道家、法家学说更是活跃，有人把这一时代誉为先秦以后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隋唐以后儒、佛、道三家并立的文化格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与广大汉族人民逐渐融合，在文化上也表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如在制度上出现了均田制、府兵制等，在文学、绘画、音乐、服饰、饮食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也都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盛行于隋唐的《西凉乐》就是少数民族乐舞与汉族传统乐舞融合的产物。而且，文化上的开放是这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佛教原是外来宗教，它的传入改变了两汉以来封建文化的单一封闭状态，使中国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在文化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丰富多姿的新面貌。如石窟艺术，各种莲花纹装饰的建筑物，大莲花尊的青瓷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结束了数百年来社会动乱、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隋王朝和代之而起的唐王朝又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疆域，形成了国土空前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南北文化合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和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扩大。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可以说充满了兼容并蓄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蓄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儒、释（佛）、道三者并行的政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以及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差异时曾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规模空前的强盛与宽容营造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的广为传播、高度发展和日趋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隋朝的智凯，唐朝的玄奘、义净、神秀、慧能等高僧在不同层次上对印度佛教进行钻研探讨、加工改造，使佛教教理逐渐中国化，适应于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因而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宗派，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其中尤以禅宗流行最广，势力最众。隋唐佛教各宗派的正式形成，是佛教高度发展和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隋唐史学也是成就斐然。自唐太宗开始，国家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由宰相监修，确立了官修史书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唐朝共编撰正史8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二十四史”中的8部在此时修成，可见唐朝正史编撰成绩

之显著。而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隋唐文学则更是光彩夺目。唐朝诗歌创作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所以，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欲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辑录唐诗 48900 多首，作者达 2200 余人。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过去任何一个朝代。而且，诗歌创作在当时甚至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全唐诗》《唐诗纪事》所载的作者，除帝王将相、官宦士人外，还有大量的伶工、商贾、僧道、医卜、渔夫、樵子、歌妓和闺阁女子，这充分反映出唐诗创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著名诗人辈出，名篇佳作大量涌现，广为流传，有些还远播日本、朝鲜等邻国。这一被史家称为“唐诗气象”的时代无疑在中国文化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此外，在散文创作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反对骈文、倡导新散文的古文运动，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在书法方面以阳冰为代表的篆书，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竞相争辉，而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书法宗师则几乎将楷书的书法艺术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绘画方面，以“画圣”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动物画，不仅画法极为精妙，而且在笔法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而王维的山水画则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赞誉。至于隋唐时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艺术，其想像之丰富，画法之飘逸则更是令后人叹为观止。

爆发于 755 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王朝的危机，从此国势日颓。五代十国之后，宋王朝的建立则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型的时期。如果说盛唐文化中如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画中的线条无不体现着唐文化昂扬开放的文化气势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宋元文化则较为内蓄精致。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兴起。在朱熹看来，“天理”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伦理纲常。至于如何认识这一“天理”，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也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理学思想一方面由于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故而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人格气节和德性情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

宋元时期的文学成就则主要以宋词和元曲为代表。宋代是我国词发展的黄金时代。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但又与诗不同，它的句式有长有短，可以配乐歌唱，后来在音节和句型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格律。据《全宋词》一书所辑，当时的词家超过千家，篇章超过两万。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有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他们的作品或豪放或婉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元曲，则是元代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窦娥冤》《西厢记》等作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元曲和唐诗、宋词一道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三颗璀璨明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由忽必烈所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不仅使中国版图空前扩大，而且使古代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于是，一方面，不仅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等宋代科技文化最杰出的成就不断向世界传播，而且中国的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绘画术、算盘等亦通过不同途径，流传到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各国，世界古代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而另一方面，国外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也经开放的国门，流入中国科技文化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阿拉伯人天文学的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继唐代之后又一个对外开放、兼容并蓄的时代。

四、闭关锁国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衰落

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朝，是中国封